

AI时代,为何我们仍需“脚沾泥土”的报告文学?

当人工智能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有一种文体却因其“不可被替代”的特质而愈发珍贵——它要求作者必须用双脚丈量土地,以良心叩问现实,将真实淬炼成文学。这就是报告文学,在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的艺术。

一场旨在凝聚业界共识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日前在京举行。此次会议是新时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作协名义召开的全国性报告文学创作的专门会议。

如何坚守真实底线,如何开拓创作新局,不仅关乎报告文学的发展,更关乎如何记录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真实为基,文学为翼

“以纪实文学为代表的纪实传统,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脉所在。”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追溯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底线,而文学是让真实震撼人心的翅膀。”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道出了这一文学体裁的立身之本。

他将报告与文学比作“肉与皮”的关系,彼此无法分割;如果没有报告的实质内容,文学就失去了根基;没有文学的表达方式,报告就丧失了感染力。

比史料更活,比理论更暖,是报告文学独树一帜的宣言。“这就要求我们的语言有时代穿透力,能将宏大主题叙事与

行走一线,深耕创作

对原则的坚守,最终要落在创作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如何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动人的个体生命体验?“行走”,成为多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口中的高频词。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我们的书斋不在室内,而在广袤的田野、火热的

工地、偏远的边陲。”徐剑分享了他的“三不写”原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真相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

“火热的现场氛围与乡村文化的全新表达,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无限可能。作家需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真正走进那些欢呼的人群、灵动的村

寨,才能写出既有时代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的作品。”贵州省报告文学作家姚瑶对“行走”的价值有着切身体会。

从已经出版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到正在创作的《“村T”传奇》,姚瑶表示自己的“村字号”系列作品,正是源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才得以触摸

直面挑战,履行使命

多位文学评论家指出,曾经以“文学轻骑兵”著称的报告文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正面临着多重困境。

首先,文学性的缺失是核心痛点。徐剑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人学”,如果缺乏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作品便会失去灵魂。“长期以来,报告文学最受诟病的是‘有报告无文学’。文学性缺失不仅体现在技巧层面,更表现在作品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

其次,创作生态的浮躁加剧了这一问题。有观察指出,部分作家没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品陷入“记流水账、假大空”或“无病呻吟”的窠臼,备受读者诟病。

在此基础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任林举从更宏观的角度补充道,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庞大的写作者群体,也导致了作品良莠不齐,进一步损害了报告文学的整体形象。

事实上,报告文学深层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的信息过载乃至AI冲击,而在于其内部:如何在时代洪流中重新站稳脚跟、校准方位?回望《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它们的永恒生命力,无不源于对时代核心命题的深切回应。这

到乡村振兴中最鲜活的脉搏。

“有些人躲在书斋里进行脱离实际的想象;有些人认为只要行走就可以了,忽略了阅读。”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纪红建认为,行走和思考缺一不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始终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创作理念。

启示我们,报告文学的力量,正来自它对真实世界的介入与建设性思考。

如何让报告文学重焕新生?关键在于重返“脚沾泥土”的现场,并实现思想深度与文学表达的统一。正如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所指出的,报告文学的血脉里流淌着社会主义文艺的基因,承担着重大责任与使命。

“作家要重视抓题材,但更要有把好的题材创造转化为好的文学作品的的能力。”张宏森表示,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就是来源于足够饱满的事实,以及基于事实的对生活的发现与洞察。

因此,无论是乡村振兴的一线,还是科技攻坚的现场,报告文学作家唯有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真诚的情感投入,捕捉数据之外的温度与逻辑背后的真实,才能创作出“为民族国家留信史”的作品。

归根结底,报告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替代”。作为中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文学的每一次深耕与突破,终将以其对真实最执着的守望、对人性最深刻的体察,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筑牢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石。

(余俊杰)



图书馆里书香浓

迟敏摄

在访谈中描绘同代人的写作风景

鲁敏

舒晋瑜始终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前线,在写作与文本的第一现场,把她近三十年深度访谈对象的名字摘出来撒向天空,就是一张中国当代文学的群星图谱。读她的文字访谈,能看到一代代作家学者身上的时间淬炼与岁月剪影,更看到她作为与谈人和记录者跨越丘壑的经年跋涉,看到她在采访背后的海量阅读与深入不懈的追问。当代现场这巨象般连绵的文学与学术群山,需要舒晋瑜这样兼具眼力、耐力与笔力的长期主义者,从中雕刻出一个个独立、滚烫、隽永的,带着时代气息与温度的创作者和思想者。最近,她又推出《从夹缝到通途——深度对话70后作家》。作为舒晋瑜的同龄人,也作为与她有过数次深度对话的写作者,捧读此书,尤为亲切,也尤为感慨。

70后而今年半数是“半百”,迢递接力的写作长河中,当中流砥柱的慷慨击拍之辈,然而这一代人整体略显“晚熟”,成长之途亦多有曲折,这里有整体外部世界文化消费图景的推演运转之变,也有个体路径的漫长抉择与旁逸斜出,还有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与乖张。从舒晋瑜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轮廓,我们这一代人的出身与经验,有相当一部分比如徐则

臣、魏微、李浩、乔叶、张楚、王十月、田耳、肖江虹等,包括我,都经过漫长、缓慢的移动,游学、打工、就业、成家、再教育等,从乡村到小镇,到县城到城乡接合部,再到省会甚至首都,这不只是地理上的变迁,更是一代中国人由乡村到城市的路径,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受益者。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着在乡下滚泥巴长大的朴素而柔软的童年,有略带贫瘠却不至匮乏的乡村记忆,一般在20岁前后即完成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介入与急切占有,这些乡村加都市、厚厚加铁硬的经历,又进一步与我们的阅读、教育、交游发生着复杂的物理与化学交合作用。

舒晋瑜一直关注写作者的阅读与审美养成,她在《中华读书报》上主持的“作家枕边书”系列传播甚广。在这一本访谈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各位写作者的阅读、文本技术构成、审美理想等。我们这一代人,在未熟未萌之期,非常幸运地遇上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面繁盛起来的出版业,世界各语种文学作品大规模翻译引进,还有版本不详但交易活跃的碟片市场,这使得我们哪怕只是身在县城、身在小中专、身在工厂流水线,除了乡间能找到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之外,也得以接

纳海外经典的大水漫灌,被口耳相传的通俗大片或艺术闷片洗礼,包括接触到各种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思潮和论争,这养成我们消化力极强却有点儿不求甚解的好胃口,伴随着品格成长,也在努力吸纳和积蓄着一切的力量与可能。

从舒晋瑜写的采访手记中,可以看到她对同代人的体察,这里面带着她自身的成长经验,也带着她对数位写作者的规律性推演,从而分析到70后作家身上的某种共性,某种交融的特征,比如故土温柔与城市铁血、精神至高与为人世故,形成这一代与作者的不同面貌。这是一群明暗交错、路带摇摆的夹缝中的面孔,带着暗眼的胎记与局限性,也带着苦涩的雄心。

说到夹缝,舒晋瑜多次用不同角度,与作家们探讨市场与写作、声名与写作、读者与写作之间的张力关系,到底为什么而写作,写作通向哪里? 这些问题,对70后而言,可谓刀刀指心,处处尴尬。我们既没有体验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写作者可能凭一个中篇或短篇就名扬文坛乃至洛阳纸贵的文学热点时期,也不像80后创作者可以通过商业出版与市场之手赢得自己的忠实读者。70后大都面向传统文学期刊投稿发表,吭

哧吭哧写,热不热冷不冷地,夹在中间,好像还没冒头,就过去了,畅销无缘,声名几无,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下的期刊读者也都人至中年,乃至渐老,正在渐渐离开小说阅读——从出生、成长到存在,似乎始终在夹缝之中。

然而,夹缝处,如同洋流交汇之处,水流险峻,水土养分却也最为富饶,兼容并蓄之力最为持久,若是能从这窄门中走出,从这激流中挺身跃出,则光亮自现,征途阔战。在这本对谈里,舒晋瑜总能抓住每位作家的某个“拐点”,他或她在调整,在加速或减速,在改换跑道,在大口喘气用力呼吸。如同灵敏的快门,她用笔记录下了这个“变幻”的时刻,这微妙而重大的跃升。对这种“拐点”的发现与刻画,我想对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来说,也许会有启悟或会心之意。因写作之路向来如此,道阻且长。

书名是对70后整体状况的一个精准概括,也可以说是美好的祝福。70后走到今天,不只是收入此书,还有她仍在继续跟踪关注之中的更多同代人,他们,我们、你们,脚踏城乡两处,汲取中外补养、走过冷暖交汇的一代人,已走出各自的风景区,不觉中已然来到一片澄明开阔之境。

书评

理解乡土,才能读懂中国

赵旭东

已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典的《乡土中国》一书,对费孝通的学术成长而言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费孝通的写作常采取先“化整为散”后“集散为整”的方式,即对所从事的课题随时随地写下多篇短文,然后再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书。《乡土中国》就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开设“乡村社会学”课程的副产品,他陆续续续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14篇文章,每一篇都处理一个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核心特征的主题。这些主题今天看来对理解中国仍具有基础且典型的意义。

书中,费孝通对传统中国社会做了深入总结。突出表现在——

其一,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传统的乡土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是因为人与土地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强调从土地里去谋求生活的种种来源。粮食的种植、家庭的组成、际际的传承、家族的延续等都与人

和土地的紧密联系存有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聚族而居的共同体。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正因人

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人不可能轻易离开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彼此之间就变得非常熟悉,由此带来了一些文化上的特点。比如,在这样一种熟悉的社会里,有语言,但是不一定事事都依赖文字,因为事情都可以面对面地说清楚。

其三,是对私人关系、人情关系的强调。关于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越是自己熟悉的人关系越强,然后逐渐向外一层层地推出去,变得疏远,最终是没什么关系的陌生人。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家总能感觉到有人情味,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差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性的依赖,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差序格局的网络里慢慢去展开的。

《乡土中国》不是以中国的视角去看中国,而是跳出传统的自我中心意识,从外部视角来观察中国,是对一个悠久文明体长期文化积累的类型把握。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特别具有中国社会的典范类型特征,诸如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为政治、私人道德等,今天在中国基层社会行走和观察,仍可见到这些特质的遗留。这在无形之中构成了对中国

国人的一种深刻提醒,即中国文化传统中深层次的乡土本色,不会随着时代转变而轻易发生改变。

当然,即便在费孝通书写《乡土中国》的时代,乡土中国的一些特征已经在适应性地发生着改变。如果说亲缘关系曾经是乡土社会关系的基础,那么各种形式的新的契约性关系正成为替代,乡土中国的社会与文

化的转型在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且,伴随着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潮流,这种转型正加速发生。许多曾经有赖于本土本土的乡镇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最终走向了世界市场。一种“本地的全球化”,在中国一些富裕乡村也成为平常的现实。

此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更使得乡土中国之变具有了一种实时虚拟在场的全球意味。遍布于城乡的直播带货、触达乡村千家万户的电商平台、发达的全球物流体系,都使得偏远的乡村生活可以瞬间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相互联系。全球政治经济的波动,也直接跟乡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乡村农民更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城乡协同发展的步伐也变得日益加快,城乡之间有了更多有互补性的联系和依赖。

凡此种种,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中国乡村未来的思考。当乡村全面振兴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实现,整体意义上的乡土中国转型和文化复兴值得期待。这或许也是今天我们还需要去重读《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动力所在,它不仅会引导我们看到乡土中国存在的那个基线的原始点究竟在哪里,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去展望未来中国及其发展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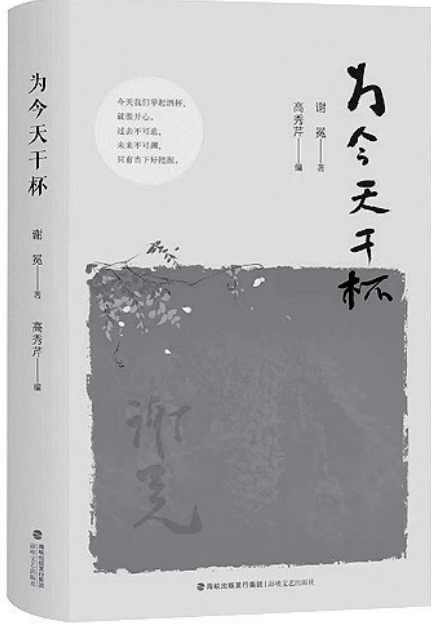
如何真正让数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这曾经是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的理想追求。今天的我们既要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不曾改变或无法改变的,它们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根基,如德国的家庭纽带、农工相辅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等。但还要看到,在持久性的乡土本色中,正迸发出能够适应世界性外部发展的现代化机遇,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产经营方式的新创造,就是乡村发展的契机与活力。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逝世于2005年,他生活的近100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百年,也是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百年。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对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建立一种清晰自觉的意识,并从中了解它的未来与发展,这从来都是那些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人毕生努力的方向,因为他们内心有着对自己文化极大的认同感。而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的一生可谓是一个典范。

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人传统中所独有的文以载道的“公器”观念。他的文字魅力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样貌。他从来没有以所谓深奥的学问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现实生活之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一种平民路线,强调专家学者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沟通。《乡土中国》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阅读目光,就是一个证明。

荐读

书写乐而忘忧的生命境界



谢冕的散文集《为今天干杯》收录近作五十余篇,兼具理性色泽与诗意叙述,内蕴着人文学者的生命智慧与青春诗情。他以凝练笔触描述自身遭遇病痛困厄的洒脱坚韧、师生亲友相知相伴的欢欣鼓舞、游历四方精神返乡的快意无拘。